

清人的蘇軾論體文批評與 歷史人物論寫作*

諸雨辰

提 要

蘇軾散文的經典化歷程在明清時期發生變化。清代文人不再延續晚明文人对蘇軾的崇敬態度，轉而與蘇軾平等對話，從而在文法、知識、義理等層面深化了明人对蘇軾論體文的分析。清代自下而上的蘇文接受以習舉業者為主，他們總結出蘇文中“無中生有”“兩扇法”等實用文法，從而為八股文寫作服務；自上而下的蘇文接受則以《唐宋文醇》等官方散文選本為代表，乾隆君臣凸顯了忠義等君臣關係的訓誡。這兩種蘇文經典化路徑都有工具化特點，容易導向對文人的馴服。作為知識精英的士大夫則既在義理方面衡量蘇軾的思想，又藉由對“道”與“勢”的思考反思文人命運。但其評價標準與自我選擇仍面臨被扭曲的危險，或者陷入“攻乎異端”的是非二元論，或者淪為為達目的而隱忍苟且。然而，文士們回應蘇軾觀點的歷史人物論，卻探索了理性思辨的深度。清人在歷史人物論中反思了攻乎異端、弱者有德、成王敗寇、固執大義等非理性觀念。這些具有反思性的人物論在清代文化傳統中頗具理性價值。

關鍵詞：清代 蘇軾 論體文 評點 寫作

*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文話與清代文學生態研究”(21CZW062)階段性成果。

一、引言

蘇軾在北宋散文家中獨具特色，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自南宋以來，蘇軾散文就在文學風貌與文人精神、文章寫作範式、知識學理反思等不同維度開始了經典化歷程，學界對此已多有關注。¹ 在文獻整理方面，樊慶彥的《蘇軾詩文彙評》廣泛搜集歷代蘇文評點資料，尤以明代評點為多。一些對蘇文評選本的研究也認為蘇文選本的刊刻與評點活動在晚明時期達到高潮，而入清後進入相對緩滯狀態，² 這不免給人以清代蘇文批評相對滯後的印象。

僅從選本數量上看，蘇文在清代的接受的確遜於明代。可是細讀清人評點，他們對蘇軾文法的剖析與思想的挖掘卻不乏細膩深入之處，尤其體現在最具蘇軾特點的歷史人物論上，呈現出與明代迥異的風貌。清人對蘇文的評價與明人有何不同，蘇文在清代不同文人群體中的接受語境如何，清人又如何通過歷史人物論寫作回應其觀點？本文擬就此做一點探討。

二、從蘇軾崇拜到蘇軾批判

在唐宋八大家散文中，蘇軾的論體文最為明人稱道，王世貞《蘇長公外紀序》謂：“獨蘇公之作最為便爽，而其所撰論策之類，於時為最近，故操觚之士鮮

1 裴雲龍：《蘇軾散文的經典化歷程及其文化內涵——以 1127—1279 年為中心》，《文學評論》2015 年第 2 期，頁 175—185。樊慶彥、劉佳：《蘇軾詩文評點的演進歷程》，《文史哲》2013 年第 5 期，頁 93—104。

2 付瓊梳理明清時期蘇文選本的刊刻情況，列出明代 102 種、清代 17 種，佐證了蘇文接受在明清兩代的不平衡狀態。見付瓊：《蘇文選本在明清時期的刊刻和流行——兼評明代蘇軾研究“中熄”說》，《蘭州學刊》2009 年第 7 期，頁 168—171。樊慶彥分析了明代蘇文評點的內容與學術價值，見樊慶彥：《明代蘇軾研究“中熄”說獻疑——兼論明代蘇文評點的學術價值》，《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 年第 3 期，頁 98—106。馬茂軍等也指出蘇軾在明代古文選本中居八家首位，入清後則讓位於韓文。見馬茂軍、楊奔奔：《明清東坡文選與古文範型演變》，《海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 年第 3 期，頁 87—93。

不習蘇公文者。”³道出蘇軾論體文的典範價值。而學習蘇文也是明代不少文人的選擇，呂留良、汪潢等人評論明代時文大家，就指出金聲、黃淳耀、章世純、周思兼、陳子龍之文皆有學習蘇軾或蘇洵的成分。幾乎與學韓、歐（歸有光、陳際泰）或歐、曾（唐順之、艾南英、黃淳耀）者分庭抗禮，可見蘇軾獨特的影響力。

文人入仕必須經過科舉，而時文“代聖人立言”的論說方式常常需要從史論中汲取營養。韓、歐、曾雖然被認為是儒家文章的典範，可是他們受人青睞的史論卻只有《對禹問》《伯夷頌》《朋黨論》《春秋論》《縱囚論》《唐論》等幾篇；柳、王又因為政治等原因而幾乎無人標榜，甚至被認為“安石亂天下”（儲欣評《秦始皇帝論》），⁴“子厚筆力更強，而害理特甚”（王芑孫評《宋襄公論》），⁵反而成了反面典型。八家中唯有蘇氏父子之論最多、最可借鑒，而蘇軾又是“三蘇”中的佼佼者。與之相應，明人對蘇文的評價也多從貼近時文寫作的結構或風格層面展開。唐順之評《伊尹論》結構之妙只下“斷”“續”二字，⁶又以“轉丸於千仞之上”形容《子思論》“借客形主”的筆法，⁷皆言簡意賅，有四兩撥千斤之效。茅坤以“川雲嶺月”⁸形容《思治論》之深入人情，印象式的評點也很傳神。鍾惺評《孫武論》則以“論一人必身處一人之前，論一事必眼出一事之外”⁹來概括蘇文具有善於設身處地、又能以旁觀者立場看透是非的特點，而“其審勢落筆皆有一段機貫於其中，而氣出乎其外”¹⁰亦可謂對蘇軾論體文思想與文采的整體概括。

可是蘇文畢竟不如韓、歐、曾的溫柔敦厚，明人有時也不免非議蘇文觀點，

3 王世貞：《蘇長公外紀序》，鄧子勉編：《明詞話全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年），頁1468。

4 儲欣：《唐宋十大家全集·東坡先生全集錄》（劍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康熙四十四年刻本），卷1，頁28b。

5 蘇軾著，樊慶彥輯著：《蘇軾詩文彙評》（南京：鳳凰出版社，2023年），卷42，頁1352。

6 同上，頁1357。

7 同上，頁1371。

8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蘇文忠公文鈔》（劍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萬曆七年刻本），卷11，頁18a。

9 鍾惺：《東坡文選》（劍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萬曆四十八年刻本），卷5，頁16b—17a。

10 同上，頁19a。

如茅坤認為《管仲論》“未盡兵之情”，¹¹錢文登批評《范增論》“未得乎增之心”。¹²但總體上看，他們對蘇文仍以褒揚為主，對其中問題多采取主動回護的策略。比如茅坤雖然批評《揚雄論》“蘇家論性道處，不免痴人說夢矣”，但接著就從章法上講“通篇因主論客，因客見主，自是文家一法門”；¹³唐順之也點出文章題為“揚雄論”，正文卻大段說韓愈，但他仍寬容地將這種“跑題”解釋為“亦一體也”。¹⁴再如《荀卿論》，蘇軾把李斯之過推到荀子的“異說高論”，王慎中只說“此尤其是長公深文手段”，¹⁵點到為止，並未攻擊其邏輯牽強；鍾惺在結尾旁批“結法似韓非”，似有微詞，但馬上下一總評道：“寫出千古來一執拗乖戾之人，皆為荆公而發。”¹⁶從寫作宗旨上為蘇軾打圓場。對比同樣喜歡議論生新的柳文，即便宏文如《封建論》，亦被明人批評在語言上“頗費詞矣”（陳靈《兩山墨談》卷二）、¹⁷在觀點上違背“天命有德”的傳統觀念（徐問《讀書札記》卷六），¹⁸由此更可見蘇軾文章在明人心中的特殊地位。

由明入清，文人對蘇文的解讀則朝著更細緻、更講求依據、也更重思辨的方向發展。他們在文法方面常能完善明人之說，而在內容層面則不無反駁之處。首先看文法論，前述唐順之以“斷”“續”二字評《伊尹論》，雖然獲得茅坤等人一致稱賞，謂其道出“文家血脉三昧處”。¹⁹但究竟如何理解所謂“斷續”，其實一直没說明白。清人張謙宜則具體在議論、敘事之關係上解釋道：

蓋以伊尹本事與關合議論相輔而行，正用議論點入本事，略叙本事旋聯議論，其互襯借勢處，謂之倏斷倏續，非文氣有截住另湊之謂也。要之，

11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蘇文忠公文鈔》，卷13，頁10a。

12 蘇軾著，樊慶彥輯著：《蘇軾詩文彙評》，卷105，頁2704。

13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蘇文忠公文鈔》，卷15，頁15a。

14 蘇軾著，樊慶彥輯著：《蘇軾詩文彙評》，卷43，頁1389—1390。

15 同上，頁1377。

16 鍾惺：《東坡文選》，卷6，頁2b—3a。

17 柳宗元著，尹占華、韓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卷3，頁215。

18 同上，頁216。

19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蘇文忠公文鈔》，卷13，頁3a。

議論原以發明本事，原非泛說本事，所以實其議論不在鋪張，能於夾縫裏做文章，血脉乃得疏暢。不然，題目正而數句可了，何以抒寫見地？此所謂文家三昧也。²⁰

如此便把《伊尹論》從議論帶出本事、又於議論間略叙本事的“斷續”筆法講透了。此外，清人也在文體風格上更細緻地區分蘇文所長與所短，如曾國藩謂：“東坡之文，其長處在徵引史實，切實精當，又善設譬喻，凡難顯之情，他人所不能達者，坡公輒以譬喻明之。”²¹將關注點放在史論與譬喻上。鄧繹《三代篇》則謂：“東坡長於策論，短於碑傳，能秀而不能隱。”²²將議論文與叙事文區別對待。當然，也有與之針鋒相對意見，李光地反而認為：“東坡文字，大約帶澀的便好，飄飄欲仙者便不佳。其小文字極妙，盛稱其策論者，不知文者也。議論既博雜，筆力又冗弱，何足取！”²³

李光地的看法是典型的理學批評之辭，延續的是宋儒對蘇軾的義理批判。而清人尤其喜歡在義理層面分析蘇文。比如《伊尹論》，明人邵寶評其“自《孟子》議論變化來”，²⁴以為淵源有自，李廷機也說蘇軾“一篇主意在辦事，原于立節，立節原于廉，盡有原委”。²⁵可是《伊尹論》的邏輯果然源於《孟子》嗎？呂留良就發難稱“《孟子》所重在‘道義’兩字”，²⁶而不是“狹天下”。張伯行也指出《孟子》講“伊尹之志”的核心是“公天下而不為私者也”，²⁷伊尹放逐與還政太甲的行為不是出於輕視天下的寡欲，而是為天下辦事的公心。蘇軾在《伊尹論》中引用了《孟子》，立節、行廉等原則也屬儒家基本價值標準。可問題在於

20 張謙宜：《覲齋論文》，王水照編：《歷代文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冊4，頁3927。

21 曾國藩：《鳴原堂論文》，王水照編：《歷代文話》，冊6，頁5526。

22 鄧繹：《藻川堂談藝》，王水照編：《歷代文話》，冊7，頁6199。

23 李光地著，陳祖武點校：《榕村語錄》（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卷29，頁522。

24 蘇軾著，樊慶彥輯著：《蘇軾詩文彙評》，卷42，頁1360。

25 同上，頁1360。

26 呂留良：《晚邨精選唐宋八家文·蘇文精選》（劍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康熙四十三年呂氏家塾讀本），不分卷，頁20b。

27 張伯行編，呂明濤、諸雨辰、韓莉譯注：《唐宋八大家文鈔》（北京：中華書局，2023年），卷8，頁727。

蘇軾在“立大節”與“狹天下”之間締造了因果關係，將前者歸因於後者，於是核心論點就變成了不貪，如果不仔細看很容易被蘇軾的邏輯帶走。明人評點大多未注意到其中強加了因果，清人經過更細緻的辨析則往往能發現其中問題。又如《孫武論下》，蘇軾提出天子御將之術：“開之以其所利，而授之以其所忌。”茅坤帶著欣賞的目光，認為其能“論孫武而發武之兵書之所不及”。²⁸ 可是蘇軾生發出來的思想卻引起清人的警覺，儲欣就覺得蘇軾把“御將”講偏了，關鍵在擇人之“道”，而“非區區之術所能濟也”，²⁹蘇軾是以“術”的邏輯遮蔽了“道”。也正是因為屢屢發現明人的評點忽視義理問題，所以清人常常連帶責備明人見識不明，如張謙宜謂：“未有背聖人道理而文獨佳者。如荆川、鹿門之評，未足信也。”³⁰

對蘇文引證史料的考證也是清人學術興趣所在。儲欣在評點《宋襄公論》時綜合《孟子》《左傳》等文獻，提出“五霸”應該是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和晉悼公，本不應包括宋襄公。《唐宋文醇》更為變本加厲，先後引述杜預《左傳注》、趙岐《孟子注》、《荀子》、顏師古《漢書注》、何休、孔穎達等諸家注釋，系統地考論“五霸”的歸屬問題。蘇文本意在攻擊宋襄公欺世盜名，而清人抓住“五霸”的知識點引申考證，正體現了清代學術風氣的特點。又如《荀卿論》，蘇軾提到李斯破壞井田制，方苞則指出“破壞井田，商鞅事也。以罪李斯，亦失之”，³¹《唐宋文醇》更指出“且井田昉於虞夏，亦不得屬之周公”；³²《賈誼論》中有“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一句，而方苞指出賈誼“痛哭”的《治安策》“乃召自長沙，獨對宣室，傳梁王後事”，³³蘇軾不顧時間順序，强行把二者扭結在一起。這些評論可謂清人考證趣味的流溢，然而在知識層面揭出蘇文之謬，其用意則是間接削弱蘇文之論證。《荀卿論》中的制度問題既然違背

28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蘇文忠公文鈔》，卷13，頁25a。

29 儲欣：《唐宋十大家全集·東坡先生全集錄》，卷1，頁34b。

30 張謙宜：《覲齋論文》，王水照編：《歷代文話》，冊4，頁3926。

31 方苞：《古文約選評文》，王水照編：《歷代文話》，冊4，頁3985。

32 乾隆編，喬繼堂點校：《唐宋文醇》（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20年），卷42，頁657。

33 方苞：《古文約選評文》，王水照編：《歷代文話》，冊4，頁3985。

事實，那麼蘇軾以李斯亂天下為由攻擊荀子的論證效力就減弱了；《賈誼論》中上《治安策》的時間不對，那麼批評賈誼“量小”的理由也就沖淡了。而基於同樣的考據興趣再看歐文，即便如沈德潛糾出《朋黨論》中漢末“黨錮之禍”的時間錯誤，也依然回護稱“文中偶誤引”而已；³⁴考證出縱囚之事不始於唐太宗，亦不影響《縱囚論》“恐後世藉口以行其好名之舉”³⁵的一片苦心。回護意味著評點者對經典作家的崇敬，正如明人對蘇文的態度。歐、蘇的對比更可見蘇文於明清兩代經歷了明顯翻轉。

總之，清人一面繼承了明人對蘇軾文法的推崇，進一步條分縷析，以更細緻、更有條理的語言分析蘇文之妙；同時又在知識考證與義理思辨層面發現明人未曾注意到的細節問題，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削減蘇軾在文學接受上的至高地位。由此，清代的蘇文批評史就呈現出迥異於明代的新特點，蘇軾開始被還原為一個可以平等對話的對象。

三、工具性：舉業文法與政治訓誡的合流

蘇軾文章在考證和義理方面都遭遇了清人的挑戰，然而批評的聲音似乎並未對蘇軾文章的流行產生影響，其在清代文評專書中的受關注程度僅次於韓愈、司馬遷、歐陽修，是當之無愧的熱門作家。³⁶這是因為無論是中下層文人以舉業為目標的學習需求、知識精英的文化心理與價值追求，還是政治頂層的皇權教化，整個社會各個階層對於蘇文接受的基本土壤沒有改變。概言之，底層與頂層的蘇文評論更多工具性的色彩，而士大夫的接受則伴隨著反思與順從的張力，下面分別討論。

蘇文自南宋以來便是舉子的學習對象，清代亦然。康熙間，唐彪的《讀書

34 沈德潛選評，賴山陽增評，閔澤平點校：《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武漢：崇文書局，2010年），卷10，頁257。

35 同上，頁258。

36 諸雨辰：《經典與非經典之間——蘇軾文章在清代的經典化歷程論析》，《新亞論叢》2021年第22期，頁237—248。

作文譜》中就稱：“東坡之文，以論為最，人稱其為千年絕調。”³⁷ 乾隆十七年（1752），張泰開提督順天學政，在《論作論》中亦提出應以蘇軾論體文為諸生程式：“作論務先達其氣，且將東坡《刑賞忠厚之至論》《物不可以苟合論》《荀卿論》《韓非論》《留侯論》《賈誼論》《晁錯論》等篇熟讀，自有暢遂疾書之樂。”³⁸ 至清末王葆心則提出蘇軾《孔子從先進》《觀過斯知仁》《君使臣以禮》諸論“本之經術，斐然成章”，³⁹ 本就是經義文章的源頭。揣摩蘇文既是長期的舉業風尚，清人的文法解剖還更為專業、細緻。那麼，蘇軾論體文中哪些文法對清人影響最大呢？

清人最常論及的蘇文筆法是“無中生有”。呂留良認為《刑賞忠厚之至論》“東坡‘殺之三，宥之三’，開想當然一例”，即“無中生有一法”，⁴⁰ 這是用典方面的無中生有；儲欣評《論武王》稱“前段巧於附會，無中生有，以伸其私說”，⁴¹ 是解讀《無逸》文本時的無中生有；《晴竹軒文法》等書稱《范增論》“無中生有”，⁴² 余誠亦具體點出文中“義帝必不能堪”與“羽之疑增”兩意“俱是無中生有”，⁴³ 是推想范增之進退選擇的無中生有；張伯行認為《留侯論》“論子房生平以能忍為高，卻從老人授書、橋下取履一節說入，乃是無中生有之法”，⁴⁴ 側重議論方式上的無中生有。總之，蘇軾人物論在各種層面都善於無中生有式的立論，這樣即便於在觀點上生新求奇，更有助於論述邏輯的統一。而通過“無中生有”，意思本已說盡的文章又能翻出一層新意，實現文勢的峰迴路轉。這種筆法有助於應對舉業中的“枯寂題”等題型，自然備受青睞。汪份在《二十四筆》中就具體羅列了“當其時”“回思當日者”⁴⁵ 等“追憶筆”的常見套語，這些

37 唐彪：《讀書作文譜》，王水照編：《歷代文話》，冊4，頁3559。

38 張泰開：《論文約旨》（上海：上海圖書館藏，光緒間無錫木活字本）卷1，頁15b。

39 王葆心：《精義策論要法·經義體制》，余祖坤編：《歷代文話續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年），冊中，頁1129。

40 呂留良：《呂晚邨先生論文彙抄》，王水照編：《歷代文話》，冊4，頁3335。

41 儲欣：《唐宋十大家全集·東坡先生全集錄》，卷2，頁31a。

42 于學訓：《文法合刻》，余祖坤編：《歷代文話續編》，冊上，頁499。

43 余誠編，呂鶯校注：《古文釋義》（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年），頁819。

44 張伯行編，呂明濤、諸兩辰、韓莉譯注：《唐宋八大家文鈔》，卷8，頁733。

45 汪份：《二十四筆》（北京：國家圖書館藏，道光二十三年刻本），卷1，頁18a。

自然也很容易在蘇軾“無中生有”的文中找到藍本。

其次是“兩扇法”，也就是將主意化作兩意，或雙起雙承，或正反對比，兩意相互映襯，共同支撐主意。比如《伊尹論》以“辦大事”和“立大節”“雙起雙承”，讀來“筆勢變幻不覺”（姚鼐語）。⁴⁶《賈誼論》以“默默自待”和“深交絳、灌”為兩根柱子，前者實而後者虛，卻能“文字渾融，不見踪迹”（唐順之語）。⁴⁷《管仲論》拈出“不可敗”與“必勝”兩層意思，分論“繁而曲”“簡而直”的攻守之道，儘管被茅坤認為不懂兵法，卻被認為在文章技法上具有“其正幅則證繁證簡，奇；其末尾則用繁用簡，更奇”（浦起龍語）⁴⁸的效果。

兩種筆法往往又合而為一，蘇軾論體文的分層立柱，首先會從《孟子》等典籍之實證發出議論，如《伊尹論》中的“立大節”、《賈誼論》中才士的“默默自待”、《留侯論》中的能“忍”，這部分內容往往比較符合經典的思想觀念。然而，只此一節不能凸顯文章的思辨性，所以又需要虛實相間、無中生有，通過想像古人或替古人打算而虛體人情，從而導出第二層論述，在翻出新意的同時又能佐證主意，在《伊尹論》中是“辦大事”一節，《賈誼論》中是“深交絳、灌”的謀略，《留侯論》中則是黃石公教其能忍一段。其第二層議論雖然“未必合於當日事情”（林雲銘評《留侯論》），⁴⁹甚至被視為“最壞人心術處”（張伯行評《賈誼論》），⁵⁰但其中往往既能翻新出奇，又有所寄託。所以汪份說：“東坡作論手段，逐層代原、逐層辨駁，而以己意收拾。學者於議論題，不可不知此法。”⁵¹這種作法既適合考場文章的問架設置，又因設身處地、善體人情而不覺迂闊，必然受到舉子和考官歡迎。

舉業效應下的文法學習體現了清代蘇文自下而上的接受路徑，而清代官方文學意識形態的宣傳則體現了自上而下的接受路徑。作為官方文學選本的

46 姚鼐編，吳孟復、蔣立甫主編：《古文辭類纂評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冊上，頁163。

47 蘇軾著，樊慶彥輯著：《蘇軾詩文集評》，卷43，頁1385。

48 浦起龍：《古文眉詮》（劍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乾隆九年刻本），卷66，頁5a。

49 姚鼐編，吳孟復、蔣立甫主編：《古文辭類纂評注》，冊上，頁175。

50 張伯行編，呂明濤、諸雨辰、韓莉譯注：《唐宋八大家文鈔》，卷8，頁740。

51 伍起輯：《先正論文鈔》（北京：國家圖書館藏，雍正十一年鈔本），卷下，頁77a。

代表,《唐宋文醇》選入蘇軾幾乎絕大多數論體文,並作了細緻評點,其中觀點直接或間接地反映了乾隆帝的意見。乾隆很欣賞蘇軾的《禮以養人爲本論》,乾隆八年(1743)還以此爲殿試考題。乾隆顯然認同蘇軾“夫禮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的說法,他借評點蘇文而進一步發揮,認爲禮是由王者推行的“率性盡倫”之道,並強調:“禮樂百年而後興,必也元首明而股肱良,立綱陳紀,始正其大而漸及其細。”“及其至也,上行下效,萬民自有馴致之勢焉。”⁵²把禮看做自上而下、由粗及細的綱紀,目的是馴致萬民,於此不難看出清代馴服文化之形成的必然趨勢。而通過蘇文評點以及後來的殿試考試,乾隆皇帝潛移默化地完成了一次政治訓誡。

不同於以考試爲目的的文章技法學習,《唐宋文醇》既然立足於皇權意志的宣傳,有時便不免需要對蘇文加以批判。比如乾隆認爲《論范增》中“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的話就很成問題,因爲只要立了義帝,項羽和范增就有了“君臣之分”,那麼項羽“矯殺卿子冠軍”就是“無君之心”,范增此時不去,還待“及弑義帝江南,而增猶爲羽謀如故”,那就是不忠誠。而如此不忠之人“則增之死久矣”,也稱不上蘇軾所謂的“人傑”。⁵³蘇軾考慮的是范增是否足夠明智,而《唐宋文醇》顯然要求絕對的忠誠。又如《晁錯論》,蘇軾覺得問題出在晁錯“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乾隆則覺得沒說到點子上,他反問:“且夫宗社者,猶人之神魂也;百姓者,猶人之肢體也。天下有殘肢體以安神魂之理乎?則亦豈有殘百姓以安宗社之理也!聖賢處此,豈果舍激之反而滅之之外,無他道乎?”⁵⁴更根本的問題是漢景帝沒有做好準備就推進激化矛盾的削藩政策。帝王的立場使其在七國之亂的問題上更敢於直視問題,也因此能跳出具體情境,站在更宏大的立場上而有了一些關懷民生的意思。

進言之,在官方層面借助評點蘇文而展開的自上而下的訓誡,與民間層面自下而上地推崇蘇軾“無中生有”“兩扇法”等技法,兩種批評在思維層面又能實現微妙的融合,從而進一步強化權力話語的運用。本來分層立柱、雙起雙承

52 乾隆編,喬繼堂點校:《唐宋文醇》,卷41,頁642。

53 同上,卷43,頁686。

54 同上,卷42,頁665。

的結構就很容易形成鮮明的對比，導向“或者是，或者非”的二元論思維，迫使人在兩種行為中二選一。可是貌似合理的那個選項如果來自“無中生有”，那麼往往在現實中無法實現。譬如《諸葛亮論》建議諸葛亮離間曹丕、曹植兄弟，謀略說得頭頭是道，茅坤就跟著蘇軾的邏輯說：“孔明節制之謀勝，而揮擢之氣寡”，“其志雖勤，而其略豈足以定天下者哉？”⁵⁵可是“仁義詐力”的二元論思維遮蔽了根本問題：蜀漢的失敗實為大勢所趨，和諸葛亮行仁義還是詐力沒有關係。黃本驥看得明白：“若魏文之時，謀臣勇將林立鄴都，豈可以口舌亂之耶？况西蜀偏安，軍供不給，即有善問之陳平，亦安所得黃金四萬斤以行其計哉？”⁵⁶再如《賈誼論》的“深交絳、灌”，王芑孫就反問道：“東坡當時何不深交介甫、惠卿，固結韓維、李定之流，而必欲與司馬溫公爭事耶？”⁵⁷很多時候個體其實是別無選擇的。

無中生有、雙起雙承的生新求奇之論固然變幻恣肆、搖曳多姿，但卻暗含著邏輯陷阱：它為本已陷入兩難困境的個體提供了一個貌似合理的選項，並且使人們相信當事人不得不這樣選。可是蘇軾給出的選項卻是“無中生有”，當事人不但没能脫離兩難困境，還被追加了一層不義或不智的枷鎖。張謙宜說：“東坡論人，多就一半件事上尋出破綻，縱筆翻攪，攪得他罅縫開張，卻已是渾身血出。”⁵⁸正道出蘇軾議論苛責古人的尖刻之處。

類似的邏輯又很容易被權力話語轉化運用，乾隆就頗諳此道。比如評《論商鞅》，乾隆就先敷衍了一番皇帝“無所私而為天下”，“國者，非他，人民而已”的大道理，把立論導向皇帝的大公無私，接著引出《禹訓》“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一段話，遂“無中生有”地製造出對立面，進而把漢武帝用桑弘羊、宋神宗用王安石都扣上“以遂其縱欲之樂也”⁵⁹的帽子。《論商鞅》固然是蘇軾有見於王安石變法而發議論，但卻從沒說過王安石是為縱欲。《唐宋文醇》的批評不過是由文勢而推出的偏見，或者說

55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蘇文忠公文鈔》，卷14，頁23a—23b。

56 黃本驥：《讀文筆得》，王水照編：《歷代文話》，冊6，頁5345。

57 蘇軾著，樊慶彥輯著：《蘇軾詩文彙評》，卷43，頁1386。

58 張謙宜：《覲齋論文》，王水照編：《歷代文話》，冊4，頁3928。

59 乾隆編，喬繼堂點校：《唐宋文醇》，卷43，頁682—683。

上對下的訓誡而已。王安石不幸成爲衆矢之的，遂被羅織出道德甚至經濟問題。實際上，乾隆本來能够理性認識“神宗之青苗等法，實欲利國利民，非有私也”（評《既醉備五福論》）。⁶⁰《唐宋文醇》對同一事件截然相反的評說，正彰顯了“兩扇法”與“無中生有”的議論邏輯在權力話語下的危險之處。

四、抗俗與從俗：義理批評的思想張力

無論是以舉業爲目標的範本還是作爲官方宣傳的選本，蘇文都難免工具化的接受。而工具化會帶來思維方式的簡單化，產生諸如是非二元論等非理性判斷。而欲超越簡單化的思維，則需要在思想層面與文本進行“對話”。這種對話主要在作爲知識精英的文人群體中展開，畢竟從韓愈、歐陽修以來，古文寫作就內涵著抵抗時俗的思想底蘊，清代士人也不例外。

無中生有、權詐作用等世俗的思維方式很大部分來自黃老哲學與縱橫術，糾正這些思維往往是儒家義理批評的使命。張伯行批評《留侯論》：“其大旨則本於老子柔勝剛、弱勝強意思，非聖賢正經道理。”⁶¹批評《賈誼論》：“中間代賈生打算一段，卻欲其深交絳、灌，使不疑忌，十年便可得志，則是權詐作用，並將上面所引孔、孟皇皇救世之心，都錯看入此途去也。此最壞人心術處。”⁶²都揭示出蘇軾思想中的權謀因素。又如沈德潛批評《晁錯論》是治標不治本，因爲晁錯問題的根源出在“純以刑名法術之學而不歸於正也”。⁶³這種解讀顯然也是從儒家思想出發來回應蘇軾文章觀點。

可是，從思想角度判斷文章純正與否卻未必有固定標準。首先是因爲道德本身難以衡量。比如方苞、姚鼐都很推崇《論魯隱公》的觀點，認爲“事核而理當”，⁶⁴“其神氣蓋近《孟子》”，⁶⁵將其視爲《孟子》的傳承。可是在方宗誠看

60 乾隆編，喬繼堂點校：《唐宋文醇》，卷 41，頁 644。

61 張伯行編，呂明濤、諸雨辰、韓莉譯注：《唐宋八大家文鈔》，卷 8，頁 733。

62 同上，頁 740。

63 沈德潛選評，賴山陽增評，閔澤平點校：《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 22，頁 497。

64 方苞：《古文約選評文》，王水照編：《歷代文話》，冊 4，頁 3984。

65 姚鼐編，吳孟復、蔣立甫主編：《古文辭類纂評注》，冊上，頁 147。

來，蘇軾卻把“道”看淺了，“只就迹上比較，而不明天理之原”，⁶⁶因為魯隱公即便做到“誅翬而讓桓”也達不到伯夷、叔齊的道行。伯夷、叔齊本就是儒家道德人格的化身，方宗誠以此苛責蘇軾，似乎把儒家之道推向了極端。而標準尺度的差異正可見文人對“理”的判斷是相對模糊的，這就使其很容易受到文本以外因素的影響。

典型的例子是《荀卿論》。王慎中已指出其中有“深文手段”，儲欣更指責：“蘇子唯恐不勝，而借其門弟子以周內之，此與明永樂十族之誅何異？濫刑甚矣！”⁶⁷將李斯的過錯歸因於荀子的“異說高論”，這套邏輯明顯是深文羅織，是縱橫家的詭辯。可是清人卻偏偏推崇蘇軾的觀點。張伯行認為：“荀卿之高談異論，其貽禍自有必然者。可謂透切事情而不詭於理矣。”⁶⁸李元春也稱贊：“至以李斯定罪，尤是鐵案。足見長公獨具隻眼。”⁶⁹方苞固然指出其中有廢井田的知識性錯誤，但認為：“摧抑學者好名求異之心，甚有補於世教。”⁷⁰沈德潛也為蘇軾背書，認為“通篇本孟子‘生於其心害於政事’之說”，⁷¹並不悖理。可見無論清前期、中期還是後期，具有理學背景的文人在《荀卿論》的問題上都一邊倒地力挺蘇軾的歪曲周納。而如果注意到這些回護之辭正好與康熙皇帝批評荀子“性惡論”的“學術之偏”，以及稱贊蘇軾“理據精詳，非苛論也”⁷²相一致，那麼其中未嘗沒有皇權意志的體現，本應具有抗俗底蘊的義理批評也出現了工具化使用。當然，攻擊荀子也給張伯行等人帶來了便利，他們正可以順理成章地攻擊“後世陽儒陰釋之學，一種高談異論”⁷³的陽明心學，文學批評於此又淪為攻乎異端的工具化使用。

亦有文人會超越對道德與義理的思辨，更加關注對文人自身價值的實現。

66 方宗誠：《讀文雜記》，王水照編：《歷代文話》，冊6，頁5724。

67 儲欣：《唐宋十大家全集·東坡先生全集錄》，卷2，頁4b。

68 張伯行編，呂明濤、諸雨辰、韓莉譯注：《唐宋八大家文鈔》，卷8，頁751。

69 李元春：《唐宋八家文選》（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圖書館藏，道光間刻本）卷5，頁12b—13a。

70 方苞：《古文約選評文》，王水照編：《歷代文話》，冊4，頁3985。

71 沈德潛選評，賴山陽增評，閔澤平點校：《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21，頁485。

72 乾隆編，喬繼堂點校：《唐宋文醇》，卷43，頁657。

73 張伯行編，呂明濤、諸雨辰、韓莉譯注：《唐宋八大家文鈔》，卷8，頁751。

浦起龍就認為《伊尹論》是“自寫志概之作，非局定伊尹、更非敷衍孟子成文也”，⁷⁴又稱《賈誼論》“讀此文，須將賈生當作者前身看”，⁷⁵可見他並不在意蘇軾是否曲解了聖道、是否有權詐作用，而是欣賞文人“辦大事”的志概以及實現功業的期待。更為“放膽”的評論出現在《范增論》中，秦篤輝認為范增不必、也不應在殺宋義時離開，因為“羽誅宋義，增無一言，其後與羽一心，是誅義必羽、增同謀也”，⁷⁶范增本來參與其中，談不上遭項羽猜疑，更何況不殺宋義便不能破章邯。王芑孫則認為即便項羽弑義帝，范增也不必離開，因為“當日諸侯之叛羽，非真為弑義帝，不過漢假此以立名耳”，⁷⁷把弑義帝之罪視為漢軍的輿論攻勢而已。二人的評論無關乎道德與義理，而純粹基於文人建功立業的立場發論，這直接挑戰了《唐宋文醇》中的官方評論。

然而，超越義理是非的個體價值追求卻也容易受到黃老思想的影響，即為辦大事而求隱忍。這種思想不僅出現在人物論，也出現在蘇軾一系列政論文中，《大臣論》主張對小人“深交無為”，《續歐陽子朋黨論》主張君子應該為調劑之術，《正統論》發揮名輕實重之意，通過讓渡作為虛名的“正統”而追求更高理想。“辦大事”的許諾給人以未來的想象，作為某種策略的讓渡價值又默許了當下的苟且。理學家“駁雜”的批評是不痛不癢的，因為此種思維方式天然適於邊緣化的文人的生存境況，並成為其精神慰藉。可是最終結果呢？試看王芑孫的嘆息：“今之君子慣用此法，但見其容身持祿，以成小人之歸而已矣。”（評《大臣論下》）⁷⁸不過成就了更多苟且而已。

有追求的文人則會進一步思考文人處境，進而對蘇軾論體文發表獨到見解，姚鼐便是其中代表。姚鼐也不認可蘇軾在《荀卿論》中提出的“李斯以荀卿之學亂天下”的觀點，他在《古文辭類纂》中已點出《韓非論》“與《荀卿論》皆有意為文字”，⁷⁹認為立論過於刻意。其後又另撰《李斯論》，認為荀子之學“大體

74 浦起龍：《古文眉詮》，卷 66，頁 2b。

75 同上，頁 16a。

76 秦篤輝：《平書》（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光緒十七年三餘草堂刻本）卷 7，頁 43b。

77 蘇軾著，樊慶彥輯著：《蘇軾詩文彙評》，卷 105，頁 2704。

78 蘇軾著，樊慶彥輯著：《蘇軾詩文彙評》，卷 44，頁 1414。

79 姚鼐編，吳孟復、蔣立甫主編：《古文辭類纂評注》，冊上，頁 169。

得治世之要”，反而是因為李斯“善探其君之隱，一以委曲變化從世好”，⁸⁰因為屈服權威而沒有堅守荀子的學說，這才禍亂天下。姚鼐從李斯的實踐中追問其個人選擇，同時對其所處的政治環境加以反思。雖然李斯的做法令人不齒，但處於從屬性權力關係中的個體是否真的有選擇呢？王芑孫也在考慮這個問題，他針對《論魯隱公》中蘇軾提出李斯應該殺趙高立功，從而取信於扶蘇，進而消除蒙恬威脅的假設發論，指出：“李斯當日欲用此法以誅趙高，勢所不能，即幸而成，亦不能保扶蘇、蒙恬之不以是罪斯而並除斯也。”在秦帝國的積威下，且不論李斯沒有能殺趙高的“勢”，即便僥幸殺了趙高也未必能取信於扶蘇，到頭來還是一死。個體既然無力改變環境，那麼在王芑孫看來，李斯之事就無法用“成敗利鈍”來審視，“不過如是則於義得矣，於心安矣”，⁸¹講究一個對得起良心而已。

文人的評點不追求舉業的現實功利，也不像官方批評那樣需要端出正統的架子，按說應該能擺脫工具性的文學批評，而具有更多超越性的思考。可無論是義理的辯論還是文人自我價值的追求，都有可能被權力話語或權力關係所扭曲，再次陷入排他性的二元論思維，或者隱忍苟且的陰謀論想象。於此可見文學批評的深度困境。當然，一旦文人在對“事”之辨析、“勢”之思考與“道”之追問中，意識到這個深度主宰文人生存環境與思維方式的權力結構，他們又能跳出蘇軾論體文所衍生出的簡單化的邏輯陷阱，形成有價值的反思。值得追問的是，這些思考對於蘇軾文章的接受以及清人文學思想的形成有何意義呢？

五、清代歷史人物論的反思意識

在清代散文史上，歷史人物論脫穎而出，成為論體文寫作的突出主題。朱鶴齡、魏禧、魏際瑞、方以智、魏裔介、戴名世、陳廷敬、方苞、沈德潛、姚鼐、李元

80 姚鼐著，劉季高標校：《惜抱軒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卷1，頁6—7。

81 蘇軾著，樊慶彥輯著：《蘇軾詩文彙評》，卷105，頁2714。

春、管同、梅曾亮等一大批文人都有不少歷史人物論存世，在數量與思考的深度上都不遜於前代。⁸² 其中諸如朱鶴齡《李綱論》、魏禧《正統論》《晁錯論》《續續朋黨論》、姚鼐《李斯論》、沈德潛《六國論》《晁錯論》《駁蘇子正統論》、李元春《後世惡秦論》等都是直接回應蘇軾文章而作。其餘大量《伊尹論》《管仲論》《伍子胥論》《秦始皇論》《范增論》《留侯論》《晁錯論》《揚雄論》等，也很可能是閱讀三蘇父子之文後有所反思而發，畢竟戴名世、方苞、沈德潛、姚鼐、李元春等人都有編纂唐宋八大家選本的經歷，他們當然會進入與蘇軾對話的多元場域中。也正是在與蘇軾的對話中，清人開掘了歷史反思的深度。

首先是對古人的同情、對其學說的開放。如上所述，蘇軾的歷史人物論容易有苛責古人的傾向，從而被權力話語所利用，而姚鼐的論體文中便有所反思。其《李斯論》就思考了在權威面前，文士有沒有勇氣堅持自己的思想、運用自己的理性的問題。呂思勉認為姚鼐“特嫉當時之脂韋緘默，借題以發其感慨耳”，⁸³但是姚鼐的借題發揮正好解構了蘇軾立論中最容易被皇權利用的一面，即通過批評荀子的“異說高論”而達到壓抑言論的目的。畢竟從張伯行“惟程、朱之論未嘗異，而天下卒無有及之者，誠萬世無弊之道也”⁸⁴的評點中，後人讀到的不正是一種文化專制的態度嗎？《賈生明申商論》也在思考這個問題。在姚鼐看來，諸子百家之說“亦各原於聖人之一端，未嘗不可相為用也”，所以諸如賈誼、諸葛亮分別以申商之學教文帝、後主，是為發揮法家思想“法制定則天下安”的長處；而反觀晁錯對漢景帝也鼓吹申商之學，則是助長了漢景帝的刻薄。問題不出在儒家還是法家，而是“賢者視其君之資而矯正之，不肖者則順其欲”。⁸⁵ 姚鼐對荀子、賈誼、諸葛亮之學說採取包容的文化態度，而揭示韓非、晁錯之弊也是放在士大夫與皇權之頡頏層面，其觀點便帶上了同情的理解，而非對學術異端的無情冷嘲。同樣從君臣關係角度同情古人的還有梅曾

82 陳惠琴、莎日娜、李小龍：《中國散文通史·清代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頁29—53。

83 俞振基：《嵩廬問學記：呂思勉生平與學術》（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年），頁267。

84 張伯行編，呂明濤、諸雨辰、韓莉譯注：《唐宋八大家文鈔》，卷8，頁751。

85 姚鼐著，劉季高標校：《惜抱軒詩文集》，卷1，頁8。

亮,其《韓非論》沒有延續蘇軾關於韓非使“天下被其毒”的思路,而是反過來指出造成韓非悲劇的根源在於“人君無賢智愚不肖,莫不欲制人而不制於人”⁸⁶的專制心理。至於韓非對現實政治中陰謀權詐的揭示,反而足見其政治上的天真。

同情古人並不意味著濫情,更不是放棄原則。清人的歷史人物論實則是通過反思對立面而非簡單虛設對立面的方式,追求對人性與道德更全面的理解。在這方面頗有見解的是李元春。其《後世惡秦論》中提到一個現象:“今使兩兒爭毆,一勝一負,旁觀之人不問曲直,大抵右負者而已。”同情弱者是常人容易出現的思維傾向,可是這種思維很容易潛移默化地導致重立場而不問是非的危險。李元春認為戰國爭霸,很難說哪國就一定有理,哪國就一定無道,那麼“使秦強而有道,果勝於六國,雖強亦何惡”?⁸⁷《後世惡秦論》的價值不在於駁斥蘇軾過秦,而是通過反問讓人審視“同情弱者”甚至“弱者有德”論的邏輯謬誤。至於論具體人物,李元春也指出管仲既有尊王攘夷之功,又有君臣之義之罪;韓信在事實上並未謀反之可憐,與其各種“非純臣”之行爲之可恨。通過事功之價值、道義之原則、事實之依據與心理之標準等不同原則,李元春避免了“全或無”的極端式思維。

再看清人對“道”與“勢”的理解。歷史人物論常有事後之見的態度,而事後之見容易暗合成王敗寇式的思維方式,譬如晁錯若是自將成功便是“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而若失敗便是發之而不能收。成王敗寇的思維很容易導向對權勢者的崇拜,可是歷史上的“勢”與“道”很可能是相反的。方苞《蜀漢後主論》就在反思這個問題。劉禪作為亡國之君,歷來是翻不了身的丑角。可是方苞一改正反雙承的論說方式,反問成湯重用伊尹、武王重用周公,而劉禪重用諸葛亮,同樣是“任賢勿二”,湯、武便是聖人,而劉禪卻“為後世話厲也久矣”。⁸⁸ 那麼後人對於“得道”與否的判斷難道不是綁定

86 梅曾亮著,彭國忠、胡曉明校點:《柏枧山房詩文集(增補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卷1,頁2。

87 李元春著,王海成點校:《李元春集》(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年),卷1,頁23。

88 方苞著,劉季高校點:《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卷3,頁69。

在其“得勢”與否的基礎上嗎？方苞的反思揭示了中國傳統思維中根深蒂固的被遮蔽的一面。再如項羽弑義帝被視為項羽敗亡的原因，《唐宋文醇》就由此生出一段關於忠誠的訓誡。而戴名世的《范增論》就指出，項羽入關破秦“以快天下鬱鬱之心”，可是義帝對破秦卻無絲毫之功，因而“項籍勢足以臣諸侯，而義帝勢不足以臣項籍”；再對比酈食其請立六國之後卻遭到了張良的制止，可見漢軍“有所立以自輔且不可”，而楚軍竟“有所立以自制”。⁸⁹ 在兩重對比中，項羽被後世施加的弑君悖逆之罪自然被理性的邏輯所解構，而楚漢之際“道”與“勢”的分裂亦被深刻揭示出來。項羽可謂失“勢”而不可謂失“道”，可見《唐宋文醇》式的訓誡未必是合理的。“道”與“勢”既然未必統一，勝利者也未必是道德完人，而失敗者也就可能從道德的枷鎖中解脫。

最後，因為能更審時度勢地看待“道”與“勢”的關係，清人便更容易在史論中認同權變的觀點，而不至於被某些“大義”所裹挾。權變的思維其實本源於蘇軾，其政論文最通人情世故，只是史論中有時為文勢所趨，不免陷入縱橫之論。清人則對於權變有了更多同情的反思。比如沈德潛《長勺之戰論》反對胡安國“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的教條，認為魯國存亡之際，即便“以詐謀取勝”也是合理的。沈德潛立論的依據就是審時度勢：“如胡子之論，可持以告窮兵黷武者，而非所施於相忍為國之朝也夫。”⁹⁰ 其《陳平論》《李東陽論》也反復指出狄仁傑事武后似乎不忠，而其實有“轉移之功”。⁹¹ 所以關鍵是實事求是、因地因時制宜，而不是拘泥於“大義”的教條。類似的見解又見於朱鶴齡《李綱論》。朱鶴齡反對拘泥“國君死社稷”之說，認為北宋末的局勢下，應當聽從種師道“幸長安以避賊鋒”或者張叔夜“詣襄陽以圖幸秦雍”的建議，不應固守京城。這篇文章直接回應蘇軾《論平王東遷》對平王遷都的批評，反對不顧現實邏輯的“徒執古義”。⁹² 回到蘇軾的原文，其中本就充滿縱橫家的誇

89 戴名世著，王樹民編校：《戴名世集》（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卷14，頁459、461。

90 沈德潛著，潘務正、李言點校：《沈德潛詩文集·歸愚文鈔》（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冊3，卷6，頁1202—1203。

91 沈德潛著，潘務正、李言點校：《沈德潛詩文集·歸愚文鈔》，頁1214。

92 朱鶴齡著，虞思徵編：《愚庵小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卷11，頁230—231。

張、虛構，蘇軾不過借反擊、正襯之文勢，而所謂“收遺民”“修德政”“占形勢”云云完全是憑空立論。一番話卻把高啓、茅坤甚至儲欣都說得心服口服，至謂為“南渡一斷案”。⁹³ 可是經歷了明朝滅亡的朱鶴齡，在慘痛的現實面前自然懂得審時度勢的權變比執守道義教條更有價值。

設身處地地同情古人而又能保持一定原則，在“道”與“勢”的問題上意識到二者時常處於分裂狀態，進而審時度勢地把握權變之法。清代文人或直接回應蘇軾、或間接受蘇軾論體文的影響，形成了更具反思性、也更具批判性的思考。他們反思弱者有德、成王敗寇等思維慣性的悖謬，尊重實事求是而不是拘守教條。在清代“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⁹⁴“後儒以理殺人”（戴震《孟子字義疏證》）⁹⁵的文化背景下，這種反思顯得尤為可貴。自下而上的舉業文章傳統不假思索地推崇蘇文，卻不顧及其中可能隱含的邏輯陷阱；自上而下的皇權意志借蘇文發揮，實則偷換為權力話語的訓誡。由此，正凸顯出方苞、沈德潛、姚鼐、李元春、梅曾亮等知識精英們的蘇文批評的價值。他們解構蘇文、對話蘇軾，喚起思想觀念上的反思，這種文學批評方式不正蘊含著以理性而祛魅、用反思來啓蒙的思想價值嗎？

結語：探尋理性精神的可能

在中國文化傳統中，理性精神往往近似於儒家精神，而陰謀論、極端論或者胡攪蠻纏則往往會被視為黃老、申商與縱橫家的特點。這固然與儒家溫柔敦厚、中正和平的追求有關，畢竟這種精神氣質下才會有理性的培育。可是儒家關注是道德而不是理性，因而在傳統文化中，理性與非理性的界限往往被偷換成學說或學派的分別，對文明與理性的追求則演變為在儒家名義下以二元論的思維“攻乎異端”。作為思想多元的士大夫，蘇軾及其論體文正好為各種學說的爭議提供了舞臺。可是試看張伯行對荀子異說高論的批評，這又何嘗

93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蘇文忠公文鈔》，卷12，頁4a。

94 戴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義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上，頁10。

95 同上，卷下，頁174。

是在探討荀學呢？不過借機攻擊陽明心學而已。傳統社會中的文化精英們不明白，或者不想明白，攻乎異端的方式並不能真正帶來理性與文明。二元論的思維既容易被權力話語所利用，成為文化規訓的手段；同時又容易被下層文人所接受，潛移默化地蘊藏在正反對比的文章寫作訓練之中。而一旦陷入長期的規訓，個體失去了運用理性的能力，或者不敢於運用自己的理性，聰明者或化身“偽士”（魯迅《破惡聲論》），更多的人則淪為麻木的承受者與看客。在不現實的浪漫主義、倔強固執的“大義”教條以及烏合之眾的群體極化中，造成不可挽回的後果。

理性的成熟運用，必須建立在懷疑與反思的基礎上。懷疑意味著從習慣性的、甚至經典化了的觀點中脫離出來，意味著個體需要自己尋找良知而不是由他人替自己定義道德，意味著個體需要自己理解而不是借助他人代替自己理解。沈德潛在《禮論》中駁斥荀子與蘇洵、王安石對“禮”的外化的、約束性的理解，強調：“聖人於禮，不過啓民之所不安，順其心之所安。”所以宰我問三年之喪，孔子並不給出回答，而是反問宰我安心與否。沈德潛意在強調禮的“合乎心之所安”，⁹⁶但是“啓民之所不安”這一過程卻道出了道德啓蒙的本質。孔子的反問是刺激宰我的不安，而唯有經過不安的思辨後，個體的選擇才是由內而外激發的“仁”，經歷這一過程的個體也才有了真的自由。道德源於內心的不安，理性也是如此，正如清人一篇篇歷史人物論所呈現的，儘管其觀點立場各不相同，但歷史在這些論體文中真正成為了問題。人人皆可過秦，但是因為秦之無道而過秦，還是僅僅因為秦之強勢而過秦？人人皆可用申商之學，但是因為彌補君王之不足而用申商，還是因為順從君王之所欲而用申商？事變面前可進可退，但是因為不切實際的幻象或教條而固執，還是經過審時度勢的判斷而權變？問題本身可能永遠沒有正確答案，正如懷疑與反思本身也並不是一種立場，可是反思性的追問卻可以迫使個體做出自己的選擇，從而讓其理性逐漸成熟。

清代文化就其整體面貌來說，似乎被認為是平庸的、壓抑的、馴服的，甚至

⁹⁶ 沈德潛著，潘務正、李言點校：《沈德潛詩文集·歸愚文鈔》，冊3，卷6，頁1214—1215。

像絕望的“鐵屋子”。可是在文學批評這個蘊含著多元場域的闡釋空間中，反思性觀點的碰撞卻在鐵板之中震蕩出一些縫隙，又在這些縫隙中生長出新一代的文章與觀點。儘管這些評論與寫作可能未必像“五四”一代那樣有意識地呼喚自由與理性、民主與科學，它們更多的還是回應傳統話題，最多是在觀念的縫隙中游走探索。可是在絕望的壓抑與革命的希望之外，清人的確在文章評點中開闢了一條具有反思性的路徑，讓理性的微光獲得照進現實的可能。

（作者：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引用書目

一、專書

- 于學訓：《文法合刻》，余祖坤編：《歷代文話續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年。
- 王世貞：《蘇長公外紀序》，鄧子勉編：《明詞話全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年。
- 王葆心：《精義策論要法》，余祖坤編：《歷代文話續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年。
- 方苞著，劉季高校點：《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 方苞：《古文約選評文》，王水照編：《歷代文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
- 方宗誠：《讀文雜記》，王水照編：《歷代文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
- 伍起輯：《先正論文鈔》。北京：國家圖書館藏雍正十一年鈔本。
- 朱鶴齡著，虞思徵編：《愚庵小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
- 李元春：《唐宋八家文選》。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圖書館藏道光間刻本。
- 李元春著，王海成點校：《李元春集》。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年。
- 李光地著，陳祖武點校：《榕村語錄》。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 呂留良：《晚邨精選唐宋八家文·蘇文精選》。劍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康熙四十三年呂氏家塾讀本。
- 呂留良：《呂晚邨先生論文彙抄》，王水照編：《歷代文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
- 沈德潛選評，賴山陽增評，閔澤平點校：《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武漢：崇文書局，2010年。
- 沈德潛著，潘務正、李言點校：《沈德潛詩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
- 汪份：《二十四筆》。北京：國家圖書館藏道光二十三年刻本。
- 余誠編，呂鶯校注：《古文釋義》。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年。
-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蘇文忠公文鈔》。劍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萬曆七年刻本。
- 柳宗元著，尹占華、韓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 姚鼐著，劉季高標校：《惜抱軒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 姚鼐編，吳孟復、蔣立甫主編：《古文辭類纂評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
- 俞振基：《嵩廬問學記：呂思勉生平與學術》。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年。
- 陳惠琴、莎日娜、李小龍：《中國散文通史·清代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

- 浦起龍：《古文眉詮》。劍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乾隆九年刻本。
- 秦篤輝：《平書》。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光緒十七年三餘草堂刻本。
- 唐彪：《讀書作文譜》，王水照編：《歷代文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
- 張伯行編，呂明濤、諸雨辰、韓莉譯注：《唐宋八大家文鈔》。北京：中華書局，2023年。
- 張泰開：《論文約旨》。上海：上海圖書館藏光緒間無錫木活字本。
- 張謙宜：《硯齋論文》，王水照編：《歷代文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
- 乾隆編，喬繼堂點校：《唐宋文醇》。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20年。
- 黃本驥：《讀文筆得》，王水照編：《歷代文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
- 梅曾亮著，彭國忠、胡曉明校點：《柏枳山房詩文集（增補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 曾國藩：《鳴原堂論文》，王水照編：《歷代文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
- 鄧繹：《藻川堂談藝》，王水照編：《歷代文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
- 儲欣：《唐宋十大家全集·東坡先生全集錄》。劍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康熙四十四年刻本。
- 戴名世著，王樹民編校：《戴名世集》。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
- 戴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義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 鍾惺：《東坡文選》。劍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萬曆四十八年刻本。
- 蘇軾著，樊慶彥輯著：《蘇軾詩文彙評》。南京：鳳凰出版社，2023年。

二、論文

- 付瓊：《蘇文選本在明清時期的刊刻和流行——兼評明代蘇軾研究“中熄”說》，《蘭州學刊》2009年第7期，頁168—171。
- 馬茂軍、楊奔奔：《明清東坡文選與古文範型演變》，《海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3期，頁87—93。
- 裴雲龍：《蘇軾散文的經典化歷程及其文化內涵——以1127—1279年為中心》，《文學評論》2015年第2期，頁175—185。
- 樊慶彥：《明代蘇軾研究“中熄”說獻疑——兼論明代蘇文評點的學術價值》，《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3期，頁98—106。
- 樊慶彥、劉佳：《蘇軾詩文評點的演進歷程》，《文史哲》2013年第5期，頁93—104。
- 諸雨辰：《經典與非經典之間——蘇軾文章在清代的經典化歷程論析》，《新亞論叢》2021年第22期，頁237—248。

The Criticism of Su Shi's Argumentative Essays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ical Essays in the Qing Dynasty

Zhu Yuchen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anonization of Su Shi's writings changed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Qing literati no longer continued the reverent attitude of the late Ming literati toward Su Shi, but conversed with him on an equal footing, thus deepening the Ming readers' analysis of Su Shi's writings in terms of rhetoric, knowledge, and Confucian principles.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bottom-up reception of Su Shi's writings was dominated by those who studied fo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They extracted some practical composition techniques from Su Shi's writings, such as "making something out of nothing" and the "two-paneled structure", to be used in the writing of the eight-legged essays. The top-down reception of Su Shi's writings was dominated by the official literary anthologies represented by *Tang Song wen chun*, in which the Qianlong Emperor emphasized the admonition of loyalty and righteousness in the ruler-subject relationship. Both of these paths to canonization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instrumentalization of Su Shi's writings, which can easily lead to the taming of the literati. As intellectual elites, the scholars not only measured Su Shi's thoughts in terms of Confucian morality, but also reflected on the fate of the literati by thinking about "Dao" and "power." However, their evaluation standards and self-selection are still in danger of being distorted, falling into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orthodox and heresy,

or compromising their principles achieve an end. However, by responding to Su Shi's viewpoints in their essays on historical personages, the literati opened up the dimension of rational reflection. In these essays, the Qing scholars reflected on irrational concepts such as attacking heresy, the virtue of the weak, the winner writes the story, and standing firm in morality. These reflective historical essays had a rational value in the cultural tradition of the Qing dynasty.

Keywords: Qing Dynasty, Su Shi, Argumentative Essay, Commentary, Writings